第二章 中央财政干部学校时期（1953年4月—1958年12月）

第一节　中央财政干部学校的组建

在中央财经学院还没有解散时，中央财政干部学校就开始组建了。1953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任务顺利完成，我国进入了大规模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财政工作也进入一个新阶段，国家对财政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财政战线急需大量具有较高政治觉悟，掌握财政、税收专业理论知识的较高级专门技术人才和财政经济管理干部。

然而当时情况是：自开国到1953年，财政干部增加到29万人，1953年各省、市、自治区税务干部约14.77万人[1]，其中经过培训的只有5万—6万人，大多数财政干部没有经过培训。在中央财政干部学校组建以前，财政部尚无一所以培训财政干部为主的干部学校。为了彻底改变干部培训工作的落后状况，提高财政系统干部的理论和技术水平，培训大批德才兼备的财政干部，适应过渡时期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于1953年4月13日发文（即财经干字第44号文）批准开办中央财政干部学校。

4月17日，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以（53）财戎21号发出由薄一波签名的通知，正式宣布：“开办中央财政干部学校，学校规模1000人，以有计

1953年5月4日中央财政干部学校国家预算执行业务研究班开学典礼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史长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23页。

划地轮训全国财政系统专区级科、局长干部和一部分主要科员，及中央级各企业、事业部门的财务干部。兹决定由戎代部长兼任该校校长，秦穆伯同志为该校副校长，并自本年4月20日正式成立。”[1]

1953年4月21日，我国第一所财政干部培训学校——中央财政干部学校隆重举行成立大会。财政部副部长吴波参加大会，宣布财政部代部长戎子和兼任校长，秦穆伯为副校长，并且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有关负责同志也参加了典礼仪式。

吴波在讲话中说：

“我们在这里（西皇城根）办学校，已经有了比较长的历史，自从税务学校以至财政学院，直到去年又合并为财经学院，今天我们又在这里办财政干校，虽然学校多次变更，但在坐的同志们都是老同志了，也就是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今天我们担负起了新的任务，就是要轮训全国的在职干部，所以我们与高等教育部联系，在财经学院抽调30名干部，在西皇城根校址，先成立财政干部学校，下期再由财经学院抽调70名干部，并在西郊地方，充实和扩大财政干校。目前学校的主要任务是轮训财政干部，开国4年来，财政部门在任的干部，已增加到29万人，而经过训

1 档案资料：4-XZ-1953-7-1。

练的才5万人，20多万干部未经过轮训，有些同志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工作的，有实际工作经验，但是理论基础差，文化比较低，必须学习，打下理论基础；有些同志是青年知识分子，工作热情很高，有培养前途，但业务还不熟悉；有些同志有一定的业务水平，但还须继续钻研，还有一些旧（社会）的行政工作人员，旧的东西须批判，政治和业务急待提高，所以必须有一个机会回一下“炉”，重新学习。我们提出‘五年计划’，把22万—23万名干部轮训一遍，财政干校必须和其他学校共同承担这一任务。财政干校不仅是以上的任务，另外还有二个任务：一是所有中央机构和银行企业的财务会计人员，也必须进行一次轮训，建立新的财务制度，7万—8万人，这是需要我们帮助轮训的；二是各大区、省市有相继开办财政干校的，但是缺乏经验，而我们的学校在中央直接领导下，收集材料方便，而且有办学经验，所以我们要对大区、省市的财政干校起指导作用，供给教材，相互交流经验，及时总结出大量新东西来。[1]

讲话中提到，学校的学习期限为半年至一年，学校当时房舍是1000人规模，首先办预算研究班，接着办会计训练班、税务班、基本建设投资班、财政监察班等。

中央财政干部学校刚刚成立的1953年5月4日，财政部就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举办“银行执行国家预算出纳业务研究班”。7月29日，研究班全体学员结业，本届研究班培养财政系统、银行系统干部386人。[2]

一、精干的管理者与逐渐充实起来的教职员

为了使中央财政干部学校尽快实施招生、教学计划，经财政部和高教

1　档案资料：4-XZ-1953-7-1。

2　档案资料：4-XZ-1953-7-1。

部协商，1953年3月31日，高教部复函：同意调秦穆伯等30名干部到中央财政干部学校工作，他们是：秦穆伯、康民、胡屏之、高景斌、阎德珍、巫昌友、杨遗謨、孙也平、于香九、韩雪清、杨轸、高钧、王乃藩、侯志兴、查平彦、王哲如、李淑萍、崔敬伯、张秉文、张俊卿、韩九鼎、戴雪英、张思超、王钢、乐俊之、邱光信、金渭然、喻惠忠、张磊。8月，又从中央财经学院选调70名教师和职工到中央财政干部学校工作。

1953年10月27日，学校教职工共计136名，其中行政人员44人，教学人员31人，一般工作人员61人。[1]

据不完全统计，1953年12月中财干校的工作人员是：

校长：王绍鏊（戎子和已不兼任校长）

副校长：秦穆伯

校长办公室：张靖、荆子裕、巫昌友、刘士元、吴荣。

秘书科：杨遗謨、孙也平、于香九、汪友竹、赵欣余、韩雪清、郭肇起、周润桂、栾孟馥、傅乃镇、王相哲、喻惠中、冯荣合。

组织科：陈健、胡屏之、高景彬、吕增、吴晶华、阎德珍、吴雅荣、杨德祥、何学仁。

党团办公室：唐文范、王静海、董连蔷。

教务处：何方明、刘迈迁。

教务科：高一民、章态浓、王乃藩、惠佩秋、江云、柴景昌、尤大韶、王林生。

当时及以后中央财政干部学校历任领导是：

表2-1　　1953—1958年行政领导一览表

姓名	职务	任职期限	说明
戎子和	第一任校长	1953年4月—1953年12月	财政部副部长兼

1　档案资料：4-XZ-1957-8-4。

续表

姓名	职务	任职期限	说明
王绍鏊[1]	第二任校长	1953年12月—1955年8月	财政部副部长兼
胡立教[2]	第三任校长	1955年8月—1956年9月	财政部副部长兼
安志诚	第四任校长	1957年9月—1958年12月	
秦穆伯	第一副校长	1953年4月—1958年12月	主持日常工作
崔敬伯	副校长	1955年9月—1958年6月	主管教学工作

其他主要领导干部有：教务长何方明；先后主管行政事务工作的秘书长张靖、武冠英；副秘书长吴荣。

表2-2　　1953—1958年党务领导一览表

姓名	职务	任职期限	说明
秦穆伯	总支书记	1953年4月—1957年10月	总支直属财政部党委
武冠英	总支副书记	1953年4月—1957年10月	

1　王绍鏊（1888—1970），江苏吴江人，1908年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精通日语。青少年时受康、梁变法和“新学”的影响，思想激进。早年投身推翻清王朝的活动，参加过讨袁护法斗争。五四运动时，他在江苏第一甲种商业学校任教，热情支持学生的革命行动，并奔走呼号，发起组织“外交大会”，揭露和抗议北洋政府的卖国罪行。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他又投身反蒋斗争，参加了1930年4月冯玉祥、阎锡山发动的联合倒蒋运动。事实上，王绍鏊在1933年10月就已经秘密入党，入党后被安排在中央特科工作。在国统区的民主运动中，他的公开身份是民主人士，实际是一名坚定的党员。“九·一八”事变后，王绍鏊在上海参加发起组织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八一三”事变后，在八路军驻沪办事处工作，并参与“华东人民武装抗日救国会”的领导工作，联系各界力量组织抗日游击队，参与太湖游击队的组织领导工作等。为宣传抗日，他还与徐铸成等发起创办了《文汇报》。王绍鏊最辉煌的成就是发起创办了中国民主促进会，成为爱国民主运动中的“中坚人物”。新中国成立后，王绍鏊先后担任财政部副部长、民进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预算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70年3月31日在北京逝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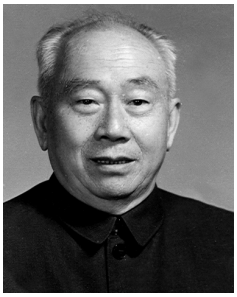
2　胡立教（1914—2006），1955年担任财政部副部长，并兼任中央财政干部学校校长。七千人大会以后，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组书记、代行长，成为中国央行历史上第三任行长。

续表

姓名	职务	任职期限	说明
秦穆伯	党委书记	1957年11月—1958年12月	1957年11月建立党委
安志诚	党委副书记	1957年9月—1958年12月	

戎子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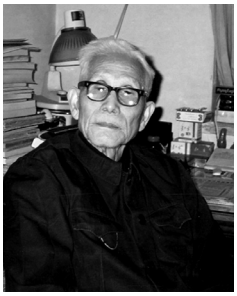
王绍鏊


胡立教

崔敬伯

秦穆伯

安志诚


武冠英

其他主要党务领导干部有：1957年11月，建立党委后，康民任组织委员；武冠英、张光三任宣传委员。

马列主义教研室：康民、李文范、高鉉钧、吕云鹤、李皓、邵铮、张光三、吴新智、毕斯基、王万有、卢鹏、董乃秀、徐忠廉、王赓舜、凌慧言、沈康南、刘昉、王廷辅、车文珍、贾永正、申润秋、赵春新。

统计教研室：徐坚、伍仪伟、胡家忠、吴春澧、陈启昆、李耀森、崔书香、刘明樾。

会计教研室：张伟弢、查平彦、鲍学曾、王珺、侯志兴、侯廼民、吴荣祖、霍稻泉、唐秀芬、王天一、卢元扬、孙昌湘、雷乐民、余顺智、吴克俭。

财政教研室：凌大珽、刁开智、张淳、钟山、孙邦治、毛宝瑞、陈延业、杨轸、吴平、胡中流。

保险教研室：李进之、陈继儒、王效文、王化南、陶声汉、吴汉林、彭载、姚达人、阎达寅。

基建班班部：耿志、黄涉、顾少康。

税训班班部：吴裕民、王嘉元、孙宝兴、赵振合。

保专班班部：苏鸿伯、程里昌、温玺。

储备班班部：方辰、薛贵福、姜国学、焦世文、张哲。

文化班：阎岱林、王宝阁、陈鸿秋、杨志成、李宗涵、徐善基。

在这个名单中，我们看到了很多熟悉的名字，他们为中财贡献了生命中最宝贵的时光。现在他们中的有些人已经作古；健在的也都离开了工作岗位，他们年事已高，解甲归田，安享晚年。

一年以后的1954年，教职工人数已增至162人（见表2－3）。

表2−3　　1954年1月教职工统计表

校长	行政人员					教学人员							总计
	处长	科长	科员	医务	小计	教授	副教授	讲师	助教	资料员	教员	小计	
1	3	12	67	4	87	6	7	15	37	2	8	75	162

当时的教授有：徐坚（统计学）、崔书香（统计学）、张伟弢（会计学）、凌大珽（财政学）、李进之（苏联国家保险）、王效文（苏联国家保险）。

副教授有：刘明越（统计学）、吴荣祖（会计学）、卢元扬（预算会计）、雷乐民（工业企业财务计划）、孙邦治（查账实务及工商业税）、杨轸（财政学）、陶声汉（人身保险）。

讲师有：康民、张光三、张明、李耀森、孙昌湘、刁开智、陈延业、

张淳、胡中流、王化南、阎呈祥、高世民、吴新智、张大炜、赵素娟。[1]

到1955年10月，中央财政干部学校有教员83人、行政人员79人、勤杂人员70人，共计232人。

1956年9月25日统计，学校的教授和副教授有：张伟弢、崔书香、徐坚、凌大挺、孙邦治。

1957年，教工173人，其中教授4人，讲师6人，教员44人，助教43人。[2]教工人数已较干校初建时的31人增加了5倍还要多。但是1954年与1957年比较，教授、副教授人数有所降低。如果没有增加，则与国家已经多年不评职称有关；但是有所降低，则与高职称教师流失有关。

二、具有鲜明“部门办学”特色的机构设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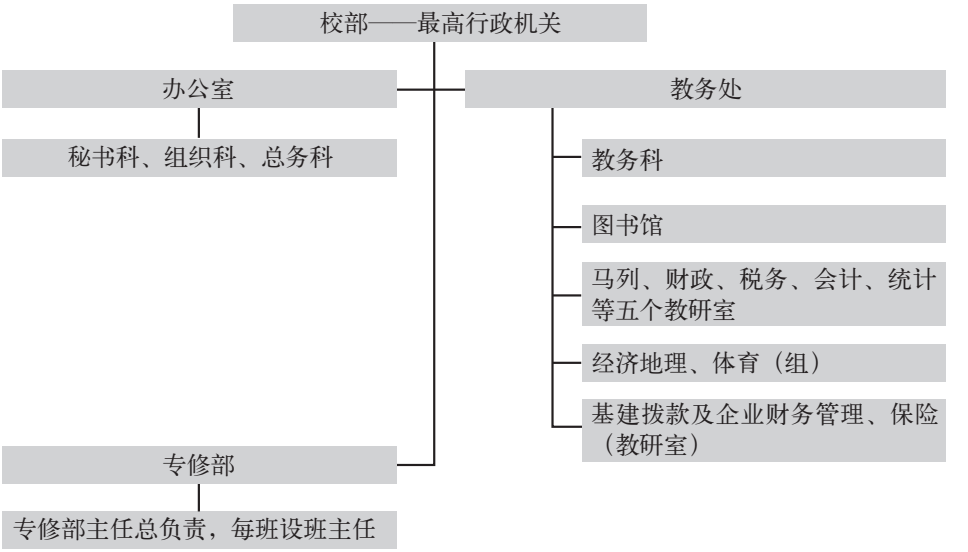
中央财政干部学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直属单位之一。学校校长等领导干部的任命直接归属财政部。据学校档案馆的档案显示，1953年12月29日，王绍鏊接替戎子和担任财政干部学校校长，任命通知的签名者为当时的财政部部长邓小平。1955年8月4日，财政部又下发通知，由胡立教副部长兼任中央财政干部学校校长。[3]

学校组织机构和组织单位始终处于变动之中。1953年，学校是校部和职能部门二级结构。校部为最高行政机关，设校长和副校长，主管全校行政教学工作。校部以下设办公室、教务处、专修部三个次级单位。（类似今天的处级单位，负责人为办公室主任、教务处处长、专修部主任）具体的组织结构模式如下：

1 档案资料：4-XZ-1958-2-1。

2 参见《1994年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校史资料汇编·吕增回忆录》。

3 档案资料：4-DQ-1956-1-6。



今天看来，专修部类似今日之学生处，直接对校长负责。1953年10月17日，学校在关于“学校编制”的说明中专门解释说：“由于学校是在训练全国财政干部长期规划下成立的训练机构，它在五年计划中要担负一定的训练干部任务，因而就不同于普通短期训练班，必须进行严格分工，即以班部人员为例，在普通短期训练班是可以不占编制名额的，但学校各班训练期间为一年或半年，而班的行政事务又是经常的、繁杂的，如果让学员兼任班部干部工作，势必妨碍学员的学习，预算执行业务研究班就已经反映出了这个问题，影响班部行政的效果，所以把班部行政人员纳入正式编制之内是极端必要的。如果以每班部设主任一人，干事二人，经常保持8个或6个班部计算，共主任8人，干事10多人。”[1]

1955年机构设置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在校长之下设教务长和正副秘书长分别负责学校教务和行政事务工作。

教务长领导教务科。教务科为教务长的办事机构，主要负责教学工作。秘书长领导校长办公室。校长办公室为学校的办事机构，又是行政事

1　档案资料：4-XZ-1953-7-1。

务部门。

班部即专修部：班部负责人为正、副班主任（大班还设有秘书）和干事。

班主任直接对校长和副校长负责，并且在秘书长和教务长指导下工作。

专修部（班部）是主要管理行政事务的一级组织，不是教学机构。当时设有：财政专修班、税务专修班、基建专修班、保险专修班、储备专修班、文化班。

教学机构是班部所属的教研室和教研组，在当时也颇类似于今天的“系”或“院”，当时设有：财政教研室、会计教研室；税务教研组、基建教研组、保险教研组、储备教研组、语文数学教研组。各教研室、教研组均设有主任或组长作为基层负责人。[1]

上述资料表明，这一时期中央财政干部学校组织结构有这样两个特点：一是二级组织机构，这种结构形式至今没有本质上的变化；二是教研室、教研组不独立，教学机构没有放在应有的位置，在结构上显示行政大于教学，这种行政权力统摄大学，教学自主空间狭隘的现象是所有大学概莫能外的。

三、机构设置的大变化

1956年，学校办学思路有了变化，开始重视教研室和教研组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机构设置相应地发生了一定的调整，一些教研室、教研组升级为学校直属。这一年学校直属教研室、教研组为：哲学教研室、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党史党建教研室、财政教研室、保险教研室、会计教研室、统计教研室（注：1956年10月23日，财政部对学校关于机构调整的请

1 档案资料：4-XZ-1957-8-3。

示作出专门批复，同意财政教研室和税务教研室合并为财政教研室，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改为哲学教研室，政治经济学教研组改为政治经济学教研室）。[1]这时的教研室和教研组至少从结构上看已经颇类似于现在的专业教学的“系”或“院”了。

1957年，学校规模有所扩大，成立了由17人组成的校务委员会，成员是：安志成、秦穆伯、崔敬伯、武冠英、陈健、苏鸣伯、康民、张光三、张伟弢、崔书香、阎达寅、孙邦治、渠慎谟、方晨、孙辉、耿志、高功福。委员会里，教授占有一定的比例。同时也开始建立处级单位。

1957年2月22日，第一次校务委员会决定撤销财政专修班、保险专修班、基建专修班、储备专修班、师资专修班等5个班部，成立学员科，各学员班以党支部的形式存在。由于学校的学员工作和干部工作统一由组织科办理，学员科成立后，组织科改为人事科。班部改为学员科，这应看作是后来主管学生的学生处的雏形。

1957年，学生人数是970人。

1958年1月28日，财政部党委下文：“党委已于1957年11月23日批准撤销财政干部学校总支部委员会，并根据党章第48条规定和学校工作的需要，建立学校党委会。”

这一时期学校结构上的变化有三方面值得记录：一个是教学机构的教研室、组在学校的位置凸现出来，一个是学校成立了校务委员会，一个是学校党的组织获允由党总支提升为党委会。

四、有计划的短期轮训培养目标

中央财政干部学校设置保险、税务、储备、基本建设拨款、会计、预算、企业财务管理等专业，学制为1年制的专修班或半年制的专修班。其

1　档案资料：4-XZ-1957-8-4。

中大部分修业期限都是1年，实际为45周（包括寒假3周在内），分为2个学期，每学期21周（包括总复习和考试），每周21—26学时不等。

学校培养目标是：培养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具有高等学校专修科业务水平或具有中级党校干部领导水平、掌握财税工作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身体健康的专门人才。

“学校的任务就是要在国家的过渡时期内，适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财政工作发展的迫切需要，有计划地以较短的修业期限轮训在职干部。学校的培养对象是全国财政系统的中层和一部分基层领导工作人员。教学目的在于提高他们的政治理论和专业知识水平，使他们明确政策观点和立法精神，以统一工作认识，充实其独立的工作能力。”[1]

五、六年的“干训”教学历程

（一）1953—1954学年

本学年自1953年9月开始，到1954年8月底结束，在学校学习的学员共有1464名，其中：1年制的税务专修班102人；1年制保险专修班179人；1年制储备专修班80人；半年制的税务训练班一期264人，二期194人；半年制的基建训练班一期291人，二期194人；会计训练班89人；文化班71人。

在制定1953—1954学年教学计划时，提出了三条原则，可以看出这一学年教学计划的思路，即一要符合本校的培养目标；二要体现学习苏联，学习人民大学；三要结合本校的条件和学员的实际。在学习苏联、学习人民大学的问题上，虽然也提出“不要照搬”，但实际上在制定教学计划时，不论在课程设置、课程比重、课程顺序、学时分配以及考试和测验等方面都仿照了人民大学专修科的教学计划。当时人民大学是新中国办高等教育的“工作母机”，在1954年4月召开的“全国高等财经教育会

1 档案资料：4-XZ-1956-7-3。

议”上，高教部副部长黄松龄作的报告中，提到培训在职干部问题时，还特别强调“中国人民大学应继续发挥‘工作母机’的作用”[1]，不仅师资培训是“母机”，教学大纲的制定、教材及教学参考资料的使用也是“母机”。当时的高等教育，是远师苏俄，近随“人大”，以冀颠覆“旧”的高等教育，重构“新”的高等教育。

关于课程设计这一问题，学院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制定了如表2−4的规定：

表2−4　　1953—1954年课程规定一览表

课程环节	具体规定
每周课时数	28—30学时，全年总学时为1000学时。
基础课	财政学、会计学原理、统计学原理，占总课时的近30%。
	税务专修班除专业统计、会计以外，还设中国现行税制和查账实务。
专业课	保险专修班除专业统计、会计以外，还设人身险、火险、运输险、苏联国家保险等四门业务课。
政治课	马列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约占总课时的30%。
备　注	各班普遍开设体育课。

1954年，又在教学计划上作了一些调整，因为从1953—1954学年教学计划执行情况看，突出的问题是课程不衔接和学员负担过重，因为自学时间太少，同学们普遍提出精简课程的要求。为此，学校在制定1954—1955学年度教学计划时，采取了一些改进措施。如减少课时，学年总课时由 1000减为900，每周从28—30学时减为22—26学时。同时精简了一些课程，把性质相同的课进行合并，如“运输险”和“火险”合并开“财产保

1　高等教育部办公厅编：《高等教育文献法令汇编》（第二辑）。

险”；“会计学原理”与“专业会计”合并，减少考试课程的分量；调整了课程顺序，如专业课开在共同课之后。

1953—1954学年是开局之学年，通过一学年的教学实践，已经初步了解调干学员的学习特点，积累了一些为适用这些特点而进行教学的经验。在财政部的直接领导和有关业务单位的支持帮助下，教学人员在理论和业务水平上，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汇集了许多有益于教学的宝贵资料，培养了新开课的教员35名，初步改进了各个教学环节的方式和方法，并根据学校的培养目标和学员的接受能力，编订了26种教材与讲稿的初稿，为提高教学质量奠定了初步基础。这一学年教学工作的成绩和经验，据现有档案资料显示有如下几个方面。

1.在教学实践中逐步总结了学校的工作方针和任务，通过传达高等财经教育会议精神和传达人民大学教学经验交流会的会议精神，澄清了干训教育的模糊认识，明确了在国家过渡时期训练在职干部的重大意义。

2.由于是开局之年，在教学计划的制定方面，几经调整，数次变动，因此，只有采取更严肃、更慎重的态度，更细致、更周密的手续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加强各方面的联系，然后才会获得顺利执行的效果。

3.协调、理顺教学各个环节的关系，如课堂教学、课堂讨论、课后辅导等等。

4.在组织领导方面，由于第一学期许多机构是新成立的，因而工作关系不够紧凑，第二学期作了某些必要的调整，并且制定了具体的工作条例，从而提高了工作效率。

5.在对外的工作关系方面，一开始，学校对外联系不是很主动，与业务部门联系渠道不畅通，财政部107次部务会议通过了“本部各单位协助财政干部学校解决教学工作上若干问题”的决议后，联系工作随之加强，解决了派教员参加专业会议和随同到现场实习、检查，以及接洽需用资料等问题。

这是这一学年办学经验的总结，也是落实1954年4月“全国高等财经

教育会议”精神，特别是落实高教部黄松龄副部长《关于全国高等财经院系方针任务》报告精神的经验总结。

这一学年学员们的学习状况是怎样的呢？1953年9月考入保险专业专修班的校友邹大牧同志在其回忆录中有着较为直观而具体的反映。

中央财干校1953年秋季入学的学员学习期限为1年，与中央税务学校不同的是有上下（秋、春）两个学期，春节有两周左右的假期。关于课程设置与师资：中央财干校显然在教学计划、课程设置、周学时、师资方面都已正规化并安排妥善了，特别是师资已专职化了。而中央税务学校的主讲老师大都是由中央负责干部、首长兼任。第一学期开设课程有：(1)马列主义基础，主要内容是讲授“共产党宣言”“联共（布）党史”等内容，笔者还保存着1951年莫斯科“外国文印刷出版局”出版的中文《联共（布）党史》等原版书一册，周学时为4学时，教师有康民、李文范，为“考查”课程；(2)政治经济学，主要讲授斯大林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周学时为4学时，教师为王廷辅，为考查课；(3)中国革命史，以胡乔木编著《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为主线，由王庚舜（中央税务学校第2期8班学员结业后）任教，周学时为4学时，为考试课；(4)财政学，有苏联参考资料，由中央财政部前综合司中层干部凌大挺及预算司张淳共同讲授，周学时为4学时，为考试课；(5)会计学原理，有苏联参考资料，由侯志兴、王珺共同讲授，周学时为4学时，为考试科目；(6)统计学原理，有苏联参考资料，由崔书香（女）讲授，周学时为4学时，为考查课程；(7)保险学，已有中文教材，由阎达寅、李进之讲授，周学时为4学时，为考试课程；(8)体育，在南四合院东侧大院上课（我记得有学习“晃板”（平衡）等内容，多年来没有体育课，挺新鲜的），周学时为4学时，为考查课程。第二学期（1954年春季在西直门外校舍开学）。开设课程有：(1)马列主义，为考试课程，余同第一学期；(2)政治经济学，为考试课程，由王廷辅，沈康南共同讲授，余同第一学期；(3)火灾保险，为考试

课，周学时为4学时，由姚达人讲授；(4)人身保险，为考查课，周学时为4学时，由刘尧卿讲授；(5)运输保险，为考查课，周学时为4学时，由柏子久讲授；(6)保险会计，为考查课，周学时为4学时，由谈通老师讲授（以上参见原“记分册”实物）。关于考试与考查的成绩分数等级，第一学期：考试课程由中国革命史、财政学、会计学原理及保险学四门，成绩按优良中差四等级记分；考察课程有马列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统计学原理及体育四门，成绩按及格与不及格记分。第二学期：考试课程有马列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火灾保险三门，积分方法按优良中差四级记分；考查课程有人身保险，运输保险和保险会计三门，记分方法按及格、不及格两级记分。我的考试课程成绩全为“优”，考查课程全“及格”，当时被称为“全优生”。

关于考试考察的运作方法。(1)考试。按苏联式（当面口试，时称“习明纳尔”）方法进行，即每门考试课程主考老师题匣中有数十道考题签，老师手中有教研组商定的标准答案（要点提纲），由参加考试学员分别依次当场抽签，参考学员按抽到的题目，独自准备（在考场）15—20分钟，然后到主考老师处，当面口述自己的答案，回答完毕后，由主考老师当场在学员记分册上签名并注明成绩。(2)考查。按苏式方法执行，即考查课程上课听讲课时数，有符合要求的笔迹、作业等等，按“及格”评分，并在记分册上由主讲老师签名并登记成绩。(3)听课时数。1953年、1954年的学员，除因病、因事假批准外，一律不存在缺课现象。[1]

（二）1954—1955学年

这一学年，学校在教学方面做了积极的探索。6月，全校师生学习了“第四次人民大学教学经验交流会传达报告”，并且进行了讨论。

部门负责人来校讲学仍然是中财的特点。7月7日，税务总局李予昂局长来校给税务专修班的学员作专题报告；7月8日，税务总局崔敬伯副局长

1 邹大牧：《大学回忆录》，参见“中财校友网”，2007年10月11日。

来校给税务专修班的学员作专题报告。

这一学年在教育教学上的主要事件如下。

10月11日和11月2日，教务处召集全体教员举行“讲授方法研究会”，讨论改进讲授方法问题。

1954年11月8日，学校公布了《中央财政干部学校关于教研室工作的暂行规定》，其主要内容是关于如何搞好教学工作，强调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均应起积极主导作用：借以通过各个教学环节，掌握学员学习情况，检查改进教学。该规定对教学中的主要环节提出了具体要求，内容包括讲授、辅导、课堂讨论、实习、考试与测验等方面。规定还详细提出了教学方法：⑴根据教学计划和学员水平，参考苏联及人民大学的有关教学大纲或业务部门提出的要求，应在每学期初，编订统一的教学大纲，教学大纲应明确规定各讲的要点、时间分配、课堂讨论题、实习题及参考书的章节页数；⑵准备教材；⑶教研室要组织对教员讲稿的讨论；⑷试讲；⑸教员之间相互听课；⑹考试准备。

1955年1月15日，财政部召开中央财政干校、西北财政干校、华东财政干校三校有关负责人会议，研究统一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问题，会议在中财举行。1954年高教部和教育部就组织统一教学计划、统一教学大纲的工作，也不断召开教学计划的审定会，财经院校自不例外，干训类的学校亦复如此。

3月16日，教务处召开扩大教务会议，对1955—1956学年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进行审查。

4月8日，教务处召集全体教员举行教学方法座谈会，讨论关于辅导和课堂讨论的问题。

5月16日，财政部又一次在学校举办三校审定教学大纲会议。

这一学年，对学员们来说，是紧张而有序的一年，是要求严格而又受益匪浅的一年。1954年秋考入物资储备专修科的校友易溪亭回忆：

现在一提起干校，人们总以为学习和生活都是松懈的。实际上当时的学习很紧张，一年两个学期的课程，都安排得较满。主要课程有政治经济学、哲学、中国革命史、财政学、会计学原理、统计学原理、储备会计、计算技术和俄语等，每个学期都有五六门主要课程，每天课程都不少，没有半天不上课的情况，尤其是考试课，每学期有三门，都是采取苏联五分制的口试方法。会计和统计学课程作业多，很费时间；俄语难学，要死记硬背；珠算、手工计算机和计算尺的计算技术课，操作性强，要经常练习。《政治经济学》是刚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新版教科书，第一次在国内发行，学起来颇为艰辛。《中国革命史》是胡绳和何干之主编的教材，内容非常丰富，哲学中一些革命经典名著也要学习。同学们都感到学习任务繁重，自觉地投入时间和精力，积极性很高。上课很少迟到，更没有早退的。晚上到阅览室复习的人很多，总得早去抢座位。当时学校对教学安排很重视，工作也很规范。如学期课程表安排得很及时，什么时候上什么课，同学们都很清楚，老师的辅导时间和地点也有详细说明。上课的主讲教师要求非常严格，都是理论和实践上有造诣的人，年青老师只能当辅导老师。政治课大多是上大课，有时还能听高级干部的报告，如学革命史时，何长工部长就给我们作了“我接毛主席上井冈山”的报告，他只用一张小字条作讲稿，讲了半天，异常生动精彩，同学们为他的革命豪情所感染，多次报以热烈的掌声。后期，陈毅外长在人民大学作“周总理出席亚非会议”的报告，我们是从分会场听的，也很受教育。每个班都有自己的专用小教室，专业课都在专用教室上。考试非常严格，开考时教室是封闭的，只有主考（即主讲）老师在场，当第一次五名同学进入后，按秩序抽签，即抽考题，然后准备20分钟，第一位同学开始考试，向老师答题，同时从外放入第六位同学准备。第一位同学答完后，老师依据情况再提出一道附加题，学员答完，老师当即评分，接着第二位同学开始答题，又将第七位同学放入教室准备，如此依次进行，直到考试完毕。由于每个考题都不相同，又在老师面前解答，因此，学生完全没有作弊的机会和可能，保

证了成绩的真实性。[1]

（三）1955—1956学年

这一学年的工作按照中央“全面规划、加强领导、整顿提高、逐步正规”的培训要求，本着“理论与实际相联系，政治与业务相结合，提高思想水平、增强工作能力”的教学方针，遵循“少而精、重点而有系统”的教学原则，按照已经制定的教学计划进行。从1955年9月1日开学到1956年7月22日结业，共开设了预算、企业财务、会计、税务、保险、基建拨款、储备等几个专修班和一个文化班。文化班这一学年共有学生55人，由于不适合学校性质的要求，文化班一年内正式结束。专修班报到时学员人数906人，其中调出工作的42人，因病和其他原因退学的35人，结业时人数829人。

学校共计开设课程25门，其中7门课程一年开设，18门课程半年开设，全年承担教学任务的教师57人，教学任务比较繁重，尤其是政治理论课的教师，人数少而显得格外紧张。

1955—1956学年的教学计划，基本上保持了1954—1955学年教学计划的框架，但也有一些变动，如税务专修班取消了“查账实务”，增添了“工业会计”；预算专修班取消了“国家银行执行预算出纳业务”，将这部分并入“预算会计与分析”；企业财务专修班取消了“工业企业组织与计划”和“国家银行执行预算出纳业务”，将“工业企业财务收支计划”改为“国民经济各部门财务”。

这一学年，除了执行教学计划外，学校还召开多次会议，讨论教学。1956年5月5日，胡立教校长亲自主持讨论下学年财政研究班教学计划。5月10日，学校举行教学经验交流会，并进行三次大讨论，至6月6日结束，武冠英作了“备课工作是教学工作的根本”的总结。6月7日，崔敬伯副校长（1955年5月16日调入中财，仍然兼任税务总局副局长）亲临教学一线，给税专人员和有关教员作了“关于周转税若干问题”的报告，6月15

1　易溪亭：《忆当年的中财干校生活》，参见“中财校友网”，2008年10月10日。

日，又作了“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后有关商品流通税、货物税问题”的报告。相关事件还有：

10月14日，崔敬伯副校长主持召开教务会议，研究“教师每周工作计

1956年中央财政干部学校第三期税务专修班毕业生合影

1956年财政研究班全体同学在陶然亭合影

1964年7月25日李先念副总理和部行领导接见我院首届毕业生与全院师生合影

划执行情况表”。

10月26日至11月2日，学校举行了教学经验交流会，全体教员和全体班部工作人员参加。

12月6—12日，财政部召开的“三校税务课程教学大纲统一审定会议”在中财举行；15—17日，财政部召开的“三校预算会计与分析课程教学大纲统一审定会议”在中财举行。

（四）1956—1957学年

1956年9月1日，新学年开始，学员报到人数为933人，上午举行开学典礼，财政部、税务总局、保险总公司的领导出席了大会。

1956—1957学年的教学计划又做了较大的变动。实行“三学段制”，增加政治理论课的时数，政治课时数占到了总课时的40%，比此前增加了近10个百分点，并将“马列主义基础课”改名为“哲学课”。

“三学段制”实行以后，产生了很多问题，如教师备课的时间不足，准备不及；学生反映“一段紧，二段松，三段大歇工”。事实上在第一段

时，学校就不得不减少了政治课的教学时数，专业课也不得不临时作了变动。这一年又加进了学习八大文件和参加整风运动。而且这一年发生了较大范围的流行性感冒，学校被迫停课20多天，教室改作了临时病房。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致使该学年的教学计划没有完成。

1957年中共中央财贸部对财贸系统中央级干校在制定教学计划的原则上作了指示，指示的要点是：全年单课独进或双课交叉；周学时16学时左右；全年不超过6门课；政治经济学必须开课，有条件的要开哲学课，内容以《实践论》、《矛盾论》为主；多开业务政策课，少开业务技术课；干校以学习政治理论和业务政策为主。

学校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制定了1957—1958学年的教学计划，但是，因为要进行整风运动，遵照财政部的指示这一年暂停培训学员。

同以往几个学年一样，这一学年，学校多次召开会议，讨论教学工作。1956年9月5日，上海、西安财政干校和中财共同讨论了国家预算、国家收入、工业统计和统计学三门课程的教材编写。11月9日，学校专门召开办公会议，研究教学中存在的问题。11月23日，学校召开扩大办公会议，研究考试改革问题，特别是政治课考试，最后决定，哲学采用写思想总结、政治经济学采用写学习心得作为考试方式。

这一学年仍然延续了校内外领导上课的教学特色。1956年9月18日，崔敬伯副校长给税专同学作了“税工同志向科学进军”的报告；10月31日，又向财政专修班学员作了“试论财政科学中的百家争鸣”的报告。11月9日，税务总局李予昂局长来学校向财政专修班税务班的同学作了“税收工作”的报告。1957年5月22日和30日，崔敬伯副校长先后作了“从历

史价格的形成谈税与价的关系”和“税务研究方法”的报告。5月25日，戎子和来校向全体学工人员作“财政制度三大平衡”的专题报告。

在这一学年的档案资料里，“学习苏联”“学习人大”的字样明显减少了。1956年4月，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5月，毛主席又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5月28日到6月1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部分省市宣传（文教）部长会议，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会上较温和地批评了照搬苏联模式，甚至提出苏式的“工农速成学校”在中国行不通。[1]在1956年初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在苏共二十大上的报告）后，中国高等教育照搬“苏联模式”的现象也逐渐降温。

（五）1957—1958学年和1958—1959学年

由于1957年夏季普遍开展整风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大跃进”运动，加上全国财政金融机构的调整，财政干部学校和总行干部学校于1958年12月合并，1957年下半年至1959年上半年，学校不得不中断开学。在此期间，学校教职工除去用一年多的时间进行整风以外，从1958年9月上旬至11月中旬，还组织了大部分教学人员和一部分行政人员深入到8个省的20多个人民公社实习工作，比较细致地研究了人民公社的财政、财务工作，为以后的干训工作做准备。

六、“干校式”师资队伍的建设

师资队伍建设是新建学校的头等大事，特别是中央财政干部学校具有特殊的校情。当时的学员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并且直接从事财政、税

1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67页。

务和其他经济领域的工作，大都有一定的工作经验，他们把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带到学校来，要求教师作出科学的、令人信服的解答。如果教师没有很高的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经验，是无法满足学员要求，顺利完成工作任务的。一开始，学校的业务课程，大部分由业务部门的有关人员讲授，采取上大课的方式，应该说，这是学校的一大教学特色，也有它的优点，但这毕竟是一时的权宜之计，长此以往，教学不规范，教学质量也是不能保证的。为此，财政部和学校领导非常重视师资队伍的培养，财政部吴波副部长亲自指示：“业务课学校还拿不起来，除暂由业务部门派人上课外，学校要准备并培养教学人员逐渐接替。”

学校师资队伍培养和提高的方式多种多样，有效的方式有：

第一，到兄弟院校进修。学校要求教师要系统和正规地学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哲学四门政治理论课，同时又要对自己担任的专业课进行深入钻研。对于专业课的学习，采取短期突击与长期培养相结合的办法，抽调部分教师到兄弟院校进修。如有的教师到人民大学或到其他高校脱产学习或旁听课程。1954年学校开办了马列主义夜校，以利于全校职工学习理论课。

第二，实际调查研究。调查分两种情况，一是学校自己组织，每年都确定几个专题到基层调研；二是参加财政部有关司局组织的调查组。1955—1956学年，学校先后派出20多位教师到北京、天津、上海、沈阳等地的工厂和有关业务部门进行短期的实习和调查。1954—1957年学校共确定生产实习部门53个，生产实习地区53个。[1]

第三，参加会议。一些教师以会议工作人员的身份参加每年的全国财政厅局长会议和全国税务局长会议，以快速了解国家财税政策和国家经济建设情况。

第四，采取以老带新、组织教师集体备课、青年教师“火线练兵”等办法，使年轻教师在教学实践中锻炼成长。

1 档案资料：4-XZ-1956-7-3。

据统计，1953—1957年，80名教师中有60人参加了各种学习，比例达到75%。

1953—1956年，经过培训和自己的努力，36名教师新开课，独立担任教学工作。

1953—1957年，到厂矿、企业、业务部门、农村参加生产实习和调查研究的教师总计53人。

关于这一时期学校的职称问题，不正规，也不统一，有教授、讲师、助教，还有“教员”。“教员”此一名目是特定时期的特殊产物，它不属于专业职称系列，但又具有一定的专业职称性质，名义上高于助教，享受的是行政级别待遇。

1956年6月，学校在给财政部的请示报告中提到“学校自1953年成立以来，由于缺乏师资，在助教中选拔一批人，边学、边教、边编，保证了教学任务的完成，三年来在实际教学岗位上，他们业务水平不断提高，教学效果良好，但是他们一直享受助教待遇。”1956年7月5日，财政部批示，在高教部关于学衔条例公布以前，学校以行政级别，提拔部分助教，统一名称叫“教员”，但分不同级别，如16级教员、22级教员等等。

七、教材建设

编写适合中国国情的教材，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也是一项任务艰巨的工作。新中国成立之初，各行各业向苏联学习，苏联专家在高等学校任教，许多社会科学的学科教材都是照搬苏联的。为了逐步改变这种状况，走一条中国特色的教育之路，各专业领域都在探索。中央财政干部学校成立后，胡立教就传达了陈云的指示，要编写出适合我国国情的教材。根据这个指示精神，学校组织力量进行了新教材的编写工作。

（一）教材涉及的种类

1953—1957年，学校先后开设的主要课程有：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马列主义基础、数学、语文、计算技术、财政学、会计学原理、统计学原理、现行税制、税务会计、企业经济活动分析、查账实务、保险学、保险会计、人身保险、运输保险、火灾保险、俄语、工业会计、基本建设会计、物资会计、政府预算会计、工业会计与分析、苏联国家收入、中国国家收入、体育、地方税、货物税、商品流通税、仓库管理、物资保管等等。

对以上课程，学校要求教师写出讲义，至少写出讲授提纲，对符合教材要求的，公开出版。

（二）教材编写的指导原则是中国化、干校化、社会化

干校成立之初，在教材建设方面遇到了许多问题。首先是大部分教材以讲授提纲的形式出现，内容过于简单，不能满足教学和同学的要求，由于没有完整的教材，摆脱不了“教师念讲稿，学生记笔记”的弊端。其次是许多业务课以介绍苏联的经验为主，对于中国的情况只作一些联系；有的课程稍好一点，把中国和苏联并列为两个部分，先讲苏联，后讲中国，但是基本上还是以苏联为主，这两种类型的教材都不能满足教学的要求。随着新中国财政事业的发展，在教学方面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校明确了“应该编写以中国为主的教材”的思路。再次，教材建设开始，还存在着教材理论水平低的缺点，许多教材的内容只是一些现行条例的堆砌，很少作系统的理论分析和原则性的阐述，对具体业务情况说明较多，但很少总结规律、讲明道理，许多东西今天刚学过，明天形势就变了，同学们对怎样改进工作仍感茫然，为此，学校提出“把编写教材工作当做科学研究工作看待，注重理论方面的建设”。

针对以上问题，学校作了积极的探索和努力，1955年5月，由中财发起组织，财政部在学校召开中央财政干部学校、华北财政学校、西北财政

干部学校三校会议，制定统一的教学大纲。

1956年，财政部又召开三校教材编写会议。中财提出教材中国化、干校化、社会化的目标。

所谓教材中国化，就是立足中国国情，以中国的实际问题为出发点，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本民族的语言和表现形式，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所谓教材干校化，就是一切从校情出发，充分考虑到学员的实际状况，他们大多来自财经一线，身经百战，有的是基层业务骨干，有的是中层领导，他们是带着问题来学习的，因此，教材必须抓住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分别从理论和政策上给予阐述，而且要重点突出，不求面面俱到，但要处理好理论和业务技术内容之间的关系。

所谓教材编写社会化，就是教材编写不能闭门造车，埋头书斋，必须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和各界取得联系，尤其要与业务部门加强联系，在他们的指导和帮助下进行。

据资料显示，1955—1956学年，“经过我们的努力，‘国家预算’、‘预算会计’等课程已经向教材中国化的方向发展，新制定的财政学教学大纲已经完全改变面貌，全部内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这一学年，我们已经编写的教学大纲和教材，曾分送给全国各省市财政干部学校，有些高等财经院校和其他业务部门的干部学校也经常来索取，目前向学校索取教材的机关和学校越来越多，我们是中央一级财政方面的专业干部学校，别人对我们期望都很大，今后要加强交流，扩大合作。”[1]

（三）财政部对教材编写的支持

在教材编写的过程中，财政部自始至终都给予大力的支持，特别是在提供教材编写的材料方面。教材编写必须有丰富的材料，否则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1957年4月，财政部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对部属干校

1　档案资料：4-XZ-1956-7-3。

的资料供应问题，并且作出了如下决定：

1．各业务单位召开的专业会议、专门问题的研究会议以及较大规模的检查工作汇报会议，均应通知学校派人参加。

2．业务资料供给的范围。一般地除有关财政方针、政策、制度、办法的各项文件，包括命令、指示、通知及有关方面的答复文件等，均应发给学校外，其他有关业务资料可由学校派人与业务单位进行具体磋商，划定供给范围。

3．各业务单位所拟定的制度、办法、草案需要内外征询意见时，亦应发给学校。

4．建立专人联系制度。

由于财政部的支持，加上学校的努力，资料存留逐年增加（参见表2−5至表2−7）。

表2−5　　1953—1957年学校自行搜集资料统计

年份	数量（份）
1953	74
1954	182
1955	341
1956	590
1957	818

表2−6　　1953—1957年学校收到外来资料统计

数量（份）	来源
1398	财政部
506	中央其他各部
146	地方各级财政机关

续表

数量（份）	来源
55	省市财政干部学校
39	中央其他各部干部学校
159	其他高等学校

表2-7　　1953—1957年学校收到财政部资料统计

单位	数量（种）
农业税司	107
预 算 司	290
经建财务司	130
会计制度司	128
行政财务司	18
文教财务司	15
公 债 处	26
财政监察司	27
办 公 厅	50
税务总局	285
建设银行总行	281
交通银行	24
保险公司	17
合　　计	1398

1956年底，学校图书馆开始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大事资料索引》，索引根据1949年以来几种主要报刊刊载的有关财政方面的政策、法令、论文、制度等重要文件，摘录汇编而成。

（四）教材编写资料收集的经验

总结5年来的资料收集工作的经验，主要有以下几点：

1.任务明确。资料工作的任务是围绕教学和科研，为教研室和教师及时提供所需要的参考资料。

2.健全管理制度。有计划地培养从事资料搜集、研究的干部。在资料的组织管理方面要逐步从分散过渡到统一集中，要有专人负责。

3.尽量扩大资料征集面。如动员学员搜集整理资料。

4.典型示范。学校总结和介绍了林犹恭同志积累资料的经验。

（五）教材讲义与讲课内容的关系

学校强调教师要发给学生教材，但要求讲课不拘泥于教材，这一规定逐步得到教师认可。开始时有些教师认为发了教材讲义自己就没的可讲了，有的老师发了教材后，照本宣科。后来随着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大家明确了要克服教条主义的教学方法，必须联系实际、深入浅出地讲课。要重点突出，条理分明，运用形象的实例、科学的分析，增强讲课内容的说服力、感染力。

学生学习有教材或讲义，在今天看来是平常不过的事情，但当时学校的一份记录反映了学校在教课与学习问题上的探索和由不成熟到逐步完善的情况（参见表2−8）。

表2−8　　1953—1957年学生使用讲义统计表

时　间	开设课程	不发讲义	发讲义	发讲义比例
1953—1954学年	15	5	10	66%

续表

时　间	开设课程	不发讲义	发讲义	发讲义比例
1954—1955学年	16	5	11	68%
1955—1956学年	22	4	18	82%
1956—1957学年	19	1	18	94%

八、求“用”务实编教材，向科学研究进军

中央财政干部学校时期的科研工作是以编写教材为主并结合专题研究进行的。

从1954—1955学年学校就开始组织科学研究工作，到1956年夏，就制订过三次全校性的科学研究工作计划。第一次计划所包含的科学研究任务过于庞大，有很大的盲目性，参加者有31人，项目有22个，由于选题不当，很多无法进行，计划完成得很差，主要原因是科学研究的任务是由教师提出，领导对于选题是否恰当基本上没有审查和研究讨论，学校仅仅把各教研室的计划汇总公布。财政部苏联专家认为很多题目的目的性不明确，因此这才引起学校的重视，学校专门请苏联专家介绍经验，准备成立学术委员会或科学研究委员会一类的机构，由委员会负责审查科学研究计划，定期举行会议，研究科研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统一组织领导，发挥集体力量。1955—1956学年，第一学期科研计划有所收缩，但是完成情况也不是很好。第二学期，科研计划又有所增加，并且举行了学校第一次科学讨论会，讨论了8篇论文，这些论文和两年来作为科学研究工作项目编写的教材，是两年来科学研究的具体成果。通过科研工作，大部分教学人员已经认识到科学研究的重要性，认为这是提高教学质量和加强教师进修的主要手段，只有通过专题研究，才能解决讲授中不明确的一些问题。参加科学研究的教师，在收集资料和论文写作上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1954年11月8日，《中央财政干部学校关于教研室工作的暂行规定》明确规定：“科学研究是提高教学质量与教员水平的基本环节之一，教研室必须结合当前教学需要，本着实事求是、稳步前进的方针，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工作，首先就课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作专题报告，撰写论文，或为将来的科研工作积累材料。科研工作要有计划、有领导地进行，教研室要通过会议或个别的方式经常进行检查，并定期地组织科学讨论会或小型讨论会，认真展开自由讨论、大胆争辩以及友爱的批评态度，有重点地帮助若干教员，在时间上和其他条件上要予以一定的保证和便利，对每一个小小的进步和成就也要予以表扬和鼓励。”

1954—1957年学校共编写教材10种，专题研究文章44篇，发出资料41种。

1956年暑期，财政部举行了第一次科学讨论会，参加讨论会的有7所大学和8个机关单位，中财有6位教师写了论文。其中有李文范的“我国过渡时期的民族政策”，谈通的“我国国家保险固定资产的损耗问题”，李皓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平改造的政策”，吕云鹤的“论我国粮食统购统销”，孙昌湘的“关于建筑安装企业财务状况的分析”，杨遗谟的“从研讨苏联周转税的建立原则中阐述在中国推行周转税的意义与特点”。

1957年1月24日，第一次校务会议决定，在校务委员会下设立学术指导小组，负责指导学校的科研工作、教材编写工作和向科学进军工作。学术指导小租由副校长崔敬伯负责，成员有武冠英、张伟弢、崔书香、孙邦治、李进之、张光三。

总结干校时期的科研工作，有以下几点经验。

1.领导比较重视，1957年还特设了由副校长牵头的“学术指导小组”，更增强了对科学研究工作的组织领导。

2.明确科学研究的方向和具体要求。过去学校曾强调科研工作为教学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方针，但实际做起来并不明确，有的题目过大，涉及面过于广泛；还有的是单位制订计划，并不是从教学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出发，而是为完成科研任务盲目研究，撰写论文好高骛远，为此，

学校提出应该本着由低到高的精神，开始时多研究一些具体问题，然后逐步提高。

3.选题必须结合教学或业务工作上存在的问题。会计教研室在1956—1957学年度的工作总结中说“我们编写的5种教材，《会计核算原理》、《工业会计与分析》、《基建会计与分析》、《预算会计》、《保险会计》都是结合现行会计制度编写的，教材的内容都要随着账户计划和会计报表的改变而改变，会计制度每年都修改，相应地教材也在不断变化之中。”[1]

4.要从实践中去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要进行调查研究，要密切与业务部门联系和合作。过去学校的科研，一般只限于从书本和报章、杂志上收集一些现成资料，缺乏对实际事务的实地调查，因此，学校强调深入实际，仅仅以苏联和中国的书本、现成材料和规章制度为取法是不够的。

5.科学讨论会是评审科学研究成果的好方法。早在干校建立初期的1953年12月5日，学校就创办了《教与学》校刊。其办刊宗旨是：第一，组织交流和推广教学与学习的经验。第二，配合教学计划要求，及时通报有关教学进展、教学内容。第三，介绍苏联和人民大学的先进经验。到1957年，在将近四年的时间里，《教与学》共出刊52期，对教学工作特别是科学研究工作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九、规章制度建设情况

1953—1956年经校长批准执行的主要规章制度可参见表2−9。

1　档案资料：7-XZ-1966-7-1。

表2-9　　1953—1956年主要规章制度一览表

年份	规章制度名称	备注
1953	《中央财政干部学校计划类报表制度》	—
	《中央财政干部学校成绩登记类报表制度》	具体规定了学习成绩的登记和报送办法，各种报表格式共计8种，规定内容均系按四级分制的要求设计的。
	《中央财政干部学校考勤类报表制度》	规定了学员出勤考查办法、报表格式和报送办法。
1954	《中央财政干部学校关于执行教学劳动纪律的暂行办法》	具体规定了教学人员在教学中应该遵守的劳动纪律，并且规定了违反劳动纪律的各种处分办法。
	《中央财政干部学校课程考试与考查暂行办法》	具体规定了考试、考查、评分、补考等等的要求和办法。
	《中央财政干部学校关于编著、翻译、校对教材及其它书籍、专论的稿酬和出版手续费的暂行规定》	具体规定了教职员所得稿酬的分配办法和编著、翻译、校对、出版等的手续。
	《中央财政干部学校关于教研室工作的暂行规定》（1954年11月8日）	明确了教研室的性质和任务，规定了教研室工作的内容和要求，明确了教研室的组织领导关系。
	《中央财政干部学校校长办公室工作条例》（1954年11月8日）	—
	《中央财政干部学校教务处工作条例》（1954年11月8日）	—
	《中央财政干部学校班部工作条例》（1954年11月8日）	—

续表

年份	规章制度名称	备注
1955	《财政部直属干部学校教师教学工作量和工作日试行办法》（该办法系学校于1955年制定，1956年财政部批准颁发执行）	具体规定了教师教学工作量和工作日的范围、定额标准、计算办法以及对教师全面工作的要求和发给超额工资的办法。这是当时学习苏联经验的一项制度，主要精神在于合理使用教师力量，保证完成教学任务；提高教学质量，开展科学研究，加强行政领导，合理计算教师编制和逐步实行按劳取酬的工资制度。
1956	《中央财政干部学校教学大纲和教材的编审、印发试行办法》	—

学校历年颁行的各项教学制度，大多数是从人民大学直接学来，有些是根据中财情况稍加修改，有些是全部搬用。如计划类、成绩登记类、考勤类三种报表制度，最初从人民大学搬过来的时候，仅仅是换了一顶中央财政干部学校的帽子。有些报表格式和内容要求很细，甚至有教条化的倾向。学校也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在1958年8月的教学总结中，学校提出要“大胆独创”，不要迷信苏联的“科学体系”。

在规章制度的执行方面，学校确实做到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以上规章制度都基本上得到了贯彻执行。仅1954年，因为各种原因，受到学校处分的人员达40多人，多数是因为上课迟到几分钟或因为放假晚归，即便是开车司机，因为汽车经常抛锚，也受到通报批评。现仍保存在学校档案馆里的，仅1954年一年由王绍鏊、秦穆伯签发的批评性《通报》就有14份之多，可见当时“执法”之严。

十、培训干部学员的情况统计

中央财政干部学校在1953—1957年共培训学员4363人，其中一年制专修班结业2470人，半年制班结业1033人，其他类型的班结业852人。见表2-10至表2-12[1]。

表2-10　　1953—1957年一年制专修班结业人数统计表

专业班	1953—1954学年	1954—1955学年	1955—1956学年	1956—1957学年	合计
财政	—	130	149	102	381
税务	100	236	130	228	694
基建	—	—	201	238	439
保险	175	—	210	185	570
储备	80	75	90	100	345
会计	—	—	49	—	49
合计	355	441	829	853	2470

表2-11　　1953—1957年半年制专训班结业人数统计表

训练班	1953—1954学年	1954—1955学年	1955—1956学年	1956—1957学年	合计
税务一期	264	—	—	—	264

1　表2-10至表2-12的数据来源于档案，4-XZ-1955-7-2，4-XZ-1957-7-3。

续表

训练班	1953—1954学年	1954—1955学年	1955—1956学年	1956—1957学年	合计
基建一期	292	—	—	—	292
税务二期	194	—	—	—	194
基建二期	194	—	—	—	194
会　计	89	—	—	—	89
合　计	1033	—	—	—	1033

表2-12　　1953—1957年其他班结业人数统计表

专 业 班	学年分布				
	1953—1954学年	1954—1955学年	1955—1956学年	1956—1957学年	合计
师　资	—	—	—	35	35
二年制研究班	—	—	—	23	23
银行执行国家预算出纳业务研究班	300	—	—	—	300
银行执行国家预算出纳业务训练班	—	—	293	—	293
财政监察训练班	—	—	—	45	45
藏族干部班	—	—	—	12	12
文化班	—	—	142	—	142
合　计	300	—	435	117	852